



韩湖初

韩湖初（1939年—），1939年出生于广西合浦县总江口。1946年，随父母举家迁移至北海居住，1958年毕业于广西北海中学，同年考上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196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广州华南师范学院（即今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士生导师，退休前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社会兼职有：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理事，广东省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广州合浦学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心雕龙》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体系初探》（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约26万字）；主编全国高校教材《古代文论名篇选读》（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40多万字）；《文学概论》（广州：广东省高教出版社）；《合浦汉代文物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多万字）。先后在国家级刊物《文学评论》（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办）、《文心雕龙学刊》（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刊，后改名《文心雕龙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国家一级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五十多篇。作为《文心雕龙美学思想体系初探》续编的《文心雕龙再探》（约30万字）即将完成于2020年出版。

1999年，应邀参加由台湾师范大学主办的《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大陆代表15人），提交论文在大会宣讲会后收入大会论文集。

2004年撰《合浦汉代文物谈》以证合浦汉墓出土文物确证无疑。（该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多万字）。发表论文详细论证合浦而非徐闻是汉武帝合浦置郡时的郡治所在。

一生与华夏文化结缘

韩湖初（1939—）1939年3月出生于广西合浦县总江口大石屯韩屋村。出生之时即逢日本飞机轰炸总江口，幸免于难。其时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前身）临时迁往大石屯韩家祠，家人便做起以师生为对象的饮食小生意，后随校迁往合浦平田村李家祠，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北海，韩一家亦随校迁徙，继续以小贩为业。韩就读于广西北海中学，高中时品学兼优，任学生会主席。1958年毕业并考上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三、四、五年级时历任班长，四年级时被评为“三好学生”（年级四个班每班一名，学制五年仅评一次）。1963年毕业时本拟留校，适逢华南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派人要求分配一名毕业生到该系从事中国古代文论教学工作，便被分配到该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士生导师和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

说起对阅读的最早记忆，韩湖初教授说，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他和几个同学到街上玩，看到一个小摊贩包东西的一张纸上印有一首李白的诗歌：“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他们几个小孩很兴奋，便大声吟诵了起来。其实，当时他们每个人也说不出为什么兴奋，心里就觉得这诗歌好听，嘴巴就忍不住念出来了。

韩教授的老家祖宗在家乡曾经显赫，是当地一个大族（村子便以韩屋村为名），但到他父辈已经衰落。为求生计父母迁徙到城镇做小商贩。所以谈不上什么家学教养，唐诗宋词这些古典文化离他还挺遥远的。不过，从这一首诗歌开始，让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选择报考大学时，数理化成绩都不错的他，却选择了去考文科。当时盛行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同班数理化好的全都选择读理科去，唯独他却选择报考文科去，连老师都觉得很愕然，为他可惜呢。

他考上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师从黄海章、邱世友等名师，主攻方向是中国古代文学。毕业后分配到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组从事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与教学。80年代开始，他集中精力从事深奥的《文心雕龙》的教学与研究。

韩湖初的学科主要研究方向是我国古代文学美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曾在中文系本科和研究生开设中国古代文论、古代美学和《文心雕龙研究》，研究兼及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远古华夏文化，有自己的心得，敢于提出新的见解，成果显著，有一定的造诣。关于《文心雕龙》研究，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引入注目：一、认为《文心雕龙》以自然之道为核心的文道观为后世宋代的苏轼、明代的公安派等继承，自成系统，更符合文学规律，影响深远，不同于以儒家之道为核心、视文学为载道的工具即“文以载道”的传统儒家文道观，但学术界多把二者混淆，显然低估了其意义和价值；二、首次具体阐述和论证、辨析《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唯物主义性质。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针对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

认为该书属“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商榷文章，首先阐述论证：一是《文心》的“道”、“神理”应指自然之道，指客观事物的规律，没有神秘色彩；而王却理解为“派生天地万物的最终原因”和超越万物的“宇宙本体的绝对精神”，显然不确；二是从该书“鉴周日月，妙极机神”可知客观规律并不神秘，“圣人”经过“观天文”、“察人文”和“监周日月”便可体道认道（并非“生而知之”），故不应被说成“充满神秘精神违反科学的谬说”；三是刘勰视儒家经典为“圣人”体道认道和为文的典范，以征圣宗经作为该书理论体系的主干，虽有其局限，但并没有视为“凌驾一切的永恒真理”；四是该书的《神思》《物色》诸篇对“心”的能动作用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是重大贡献，并未如王所说作了“荒诞夸大”。并指出早在一千多年前我国古代文论对“灵感”已经作出比较科学的阐述，与西方的充满神秘色彩的神灵附体的“灵感论”完全不同，其贡献具有指标性意义，等等。牟世金先生早于韩提出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具有唯物主义性质，而韩首次作出具体详细论证，可补其不足。其时韩踏文坛不久，可谓“初出茅庐”，却能提出如此与名家不同的系统见解，其后亦未见被批驳，是为难得。（分别见《略论〈文心雕龙〉的唯物主义性质——与王元化同志商榷》和《论〈文心雕龙〉的“圣人”》，分别载《文心雕龙学刊》第3辑和第5辑，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和1988年）。其后还发表《再论〈文心雕龙〉的朴素唯物主义性质及其统一性》和《关于〈文心雕龙〉属“心、道二元”或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商榷》，再次深入对此反复辨析（分别载华南师大学报2006年第6期和《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编，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12月），至今亦未见反驳文章；三是提出《文心雕龙·辨骚篇》的“博徒”应训“博通之徒”。自名家范文澜释为“博徒”为“赌博之徒”，数十年无人异议。韩根据该篇及《知音篇》称楼护为“博徒”，韩查《汉书》本传：此人并非赌徒，且博学多才，曾为京兆尹，有声誉，再结合上下文和该书理论体系，提出“博徒”应训“博通之徒”，如此更能准确把握该书的理论体系，被年会综述报道称为“与权威著本大相径庭的结论”（《文心雕龙学会第11次年会论文综述》，《文心雕龙研究》第11辑，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年）。个别学者曾对此提出质疑，经韩辨析后未见反驳；四是对该书的影响作了比较全面而具体的评述。由于刘勰寄居佛寺且最后皈依佛门，故后世一般崇尚儒家的仕人学子较少公开提及所受该书的影响，学界除了概括该书为“体大思精”、“空前绝后”的巨著，对其后世影响论述一般较为空泛。韩则不但引罗宗强教授指出其理论与范畴具有前瞻性，如旨在革除浮艳文风的唐宋诗文革新运动在理论上数百年前该书已经提出了，韩还指出其另一方面少人论及的巨大影响：其后一千多年作为仕入学子学诗为文的“门径”即基本教材，就此而言其影响是巨大深远和无以估量的。（见《略论〈文心雕龙〉对后世的影响》，《文心雕龙研究》第6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五是追溯该书与我国远古时代的北斗崇拜和生命美学思想的渊源关系，如作为该书总论的“枢纽”，源自远古先民以“枢纽”为宇宙

天体中心运行的观念即“北斗崇拜”（见《〈文心雕龙〉对我国远古时代生命美学意识的继承和发展》，《文心雕龙研究》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又如作为该书理论主干的“征圣”思想源自《山海经》视“圣人”能体道“认道”的思想、该书的生命美学思想源自我国远古先民的生命意识。（分别见《〈文学雕龙〉之道溯源》，《文学雕龙研究》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从〈山海经〉到〈文心雕龙〉》，《文心都研究》第8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六是首次把《文心雕龙》与西方近代史上的美学大师康德、黑格尔从时代背景和艺术本质论、艺术想象论、作家论和美学方法等等方面作系统比较，得出二者水平接近的结论（见韩著《文心雕龙美学思想体系初探》）。1999年应邀参加在台北举行的“《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刘勰〈文心雕龙〉“文德说”的意蕴和价值——从与康德的比较看其历史贡献》，在大会宣讲并收入大会论文集《〈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等等。以上见解，或填补学界研究之不足，或为人所未论的独到见解。此外，关于《刘子》的作者和刘勰《灭惑论》的撰年，韩亦提出自己的辨析主张，令人瞩目。关于前者，自南宋以来数百年有刘勰与刘昼两说，纷争不断。林其铤、陈凤金伉俪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考订为刘勰所著，但和者盖寡。其后林、陈又花二十多年精力作搜集丰富材料，详细考证、辨析，撰《刘子集校合编》上、下册共130万字，重申其说。韩先后发表《刘勰与刘昼，谁更具备〈刘子〉作者之条件》（载《文心雕龙研究》第11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年）和《〈刘子〉应为刘勰撰——〈刘子〉作者争论评述》（载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13次年会论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又载《中国文论》第2辑，戚良德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经韩与涂光社、朱文民等力挺，至今虽仍有论者持刘昼说，但未见直接反驳文章。关于刘勰《灭惑论》撰年有齐、梁两说，前者乃龙学名家杨明照所倡，资料版本方面证据言之凿凿，牟世金等力挺其；后者由著名学者王元化提出，继有李庆甲详细辨析指出：撰年应在梁武帝崇佛佞佛已经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和道教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梁天监十六年间。近年相继有论者力挺齐代说。韩指出关键在于哪个朝代具备产生《三破论》与反驳其说的《灭惑论》之争的社会客观条件。如果齐代并不具备，无疑于釜底抽薪，版本资料方面证据再多也无济于事，并认为李庆甲的辨析详细有力，故力挺其说，并提供有力的佐证。（见《〈灭惑论〉撰于梁天监年间刘勰任萧绩记室任上》，《中国文论》第5辑，戚良德主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鉴于韩的研究成果显著，多年来（至退休）一直被选为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理事，又被聘为《文学雕龙词典》（修订本，贾锦福主编，济南出版社2010年）编委。山东大学戚良德教授编的《千古文心——牟世金先生九十周年诞辰纪念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不但收入韩的论文《牟世金先生考证〈文心雕龙〉成书年代和刘勰生卒年之贡献》，还刊载韩与龙学前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秘书长牟世金先生合照。韩现已年届八十，受邀参加由山东大学戚良德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

心雕龙》汇释及百年‘龙学’学案”。

除了《文心雕龙》研究，关于古代文论和古代美学研究也有显著成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司马迁史传文学理论初探》（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该文把司马迁的文学见解和他的《史记》写作实践结合起来考察，并提高到我国古代史传文学理论总结的高度认识，见解独到。一九九五年在《文学评论》第三期发表《“生命之喻”——对一个中、西共同的美学命题的认识与思考》，为该校中文系在国家级刊物《文学评论》正刊首次发表的论文，对中西美学均以生命有机体比喻文艺作品追溯到人类远古时代的生命意识和审美意识，视野开阔，立意新颖；论文《老、庄对我国远古审美意识的继承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论人所未论（载1996年华南师大学报第1期）；又发表《论老子之道的生命美学意蕴》（2002年华南师大学报5期），论老子美学思想者论著多有，但从生命美学的角度者少，与前文可谓姐妹篇。等等。

韩热心和关注家乡的文化建设。2004年广西文化厅和北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在北海合浦县召开“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韩作为协办单位的广州合浦学会副会长参与筹备。韩与夫人杨士弘（华南师大地理系教授）协助邀请杨的中山大学地理系同届同学、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研究员杨文衡和中国科学院出版社研究员吴三保以及中国地理学界泰斗、中科院资深院士吴传钧，还有司徒尚纪（中山大学地理系博导）、杨式廷（研究员、广东省博物馆原副馆长）等多位全国著名专家学者与会。其中尤以吴传钧院士的莅临引入注目，大大提高了会议的规格和影响。韩撰综合评述文章指出：汉时合浦可利用东北季风让航船沿北部湾海岸航行直达南洋，且有数千座汉墓的文物为证，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开通的航线始于汉代，北海·合浦是最早始发港，且有数千座合浦汉墓出土的文物为证。引证资料具体而详尽，确凿无疑。该文先由北海市文史委编辑的《北海文史》第18辑、广州合浦学会和合浦县志办合编的《珠光帆影丝路长》作为大会资料印发，并得到吴传钧院士大会报告和论文的肯定和赞扬，为会议的结论即北海，合浦是我国最早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奠定基础，由此对研讨会的圆满成功作出贡献。又关于汉时置郡时郡治是合浦还是徐闻，文献记载和学术界有歧义。韩不但撰文辨析指出：首先，从文献记载来看，徐闻说的主要证据是《汉书·地理志》记载把徐闻列为合浦郡五县之首，由此推论置郡时徐闻为郡治，但该书并没有明确说首县便是郡治，故推论难以成立。有论者引《旧唐书·地理志》载岭南七郡中除合浦外其他六郡均以首县为郡治为证，但该书介绍徐闻时仅称“汉县名”。如果确曾为郡治，不会遗留。特别是韩还查《后汉书·郡国志》则明确记载合浦为该郡首县，明确说“凡县名先者，郡所治也。”该书还说：从先秦至东汉有关郡县的设置和改动均有记载，其中合浦郡治并没有改动。还指出已有多位学者引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称：郁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县，汉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这无疑比记载徐闻为郡治的清朝文献更具权威性。韩还具体分析：合浦县处于全郡

的中心，为汉时我国通往南洋和西亚的“交趾之道”的门户；而徐闻则偏于全郡的东部，虽是扼海南岛之咽喉，但其时该岛尚未开发，故郡治没有设在徐闻而不设合浦之理。可见合浦而非徐闻是置郡时郡治所在。（以上见《关于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研究述评》和《两汉时期合浦一直是郡治所在——读〈后汉书·郡国志〉序》，均收入合浦会议研讨论文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吴传均主编、吕余生副主编，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2006年；后者还收入《北海史稿汇纂》，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年）。韩又在《大众考古》发表《合浦汉墓群见证汉代“海丝”的繁荣》，详细介绍合浦是最早始发港和合浦汉墓的文物（见该刊2015年7期，江苏人民出版社），宣传家乡海丝路的光辉业绩。韩还著《合浦汉代文物谈》（《北海文史》25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对合浦数千座汉墓出土有较高价值的文物作了详细的介绍，以无可辩驳的文物证明合浦的最早始发港地位。该书内容丰富，文笔生动，为北海市作为“历史名城”提供了丰富而确凿的文物证据，并由北海市有关部门举办以该书为主要内容、题为“与历史文明遗存的对话”的座谈会，宣扬北海·合浦的光辉业绩和传统文化，反映良好。又撰文批评广东有报刊称“封开是岭南文化发祥地”，指出西江地区的苍梧古国和广信对中原文明向岭南传播和发展的重大贡献（见《西江文化研究》，李俊康主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韩及时宣传廉州知府王乃宾推行“急公兴学”运动的贡献。王乃宾为合浦廉城播箕屯人，在晚清风雨飘摇中推行“急公兴学”，以兴邦御侮，振兴中华。王停办私塾，大办向平民子弟开放的识字班和小学，很快在全县乡镇普及，令穷人平民子弟能够入学读书。此举唤醒民众，获朝廷嘉奖，御赐“急公兴学”牌坊。由此大批青年觉醒参加革命运动，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孙中山先后到钦州和防城策动起义。民国建国不久，推翻清廷的民国师旅级将领前往参拜建于廉州城南的“急公兴学”牌坊（今已被毁）近二十人，先后主政两广的陈济堂、陈铭枢、香翰屏等均在其中。可见此举对廉州府四县由封建时代走向现代社会，推翻封建旧制，培养现代化人才，意义重大，功不可没。但此事至今几乎湮灭无闻，极少有人知晓。幸有曾日洪（其母即王乃宾孙女）搜集了这方面丰富的材料，韩与曾合撰《近代廉州府的“急公兴学”运动》对此作了详细评介和高度肯定（载广西《文史春秋》2018年第6期），为岭南南路和合浦、北海近代史增添光辉的华章，并呼吁有关单位予以重视研究，建议重建牌坊，铸王乃宾铜像，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景点，弘扬光大。

韩自小热爱中华民族文化，还对华夏远古文化有所探索。如：撰《盘古之根在中华》和《闻一多“盘古即伏羲”说难以动摇》指出把我国古代盘古神话传说视为源自印度不能成立（分别载广州师院学报1998年2期和华南师大学报2001年1期）；认为《中国上古“大统一”应从黄帝时期开始》和《从黄帝谱系看远古华夏的“大统一”》（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黄陵文典》之《黄帝研究卷》和华南师大学报2008年第1期），

认为我国的“大统一”始于黄帝时期的五帝大联盟，批评上世纪三十年代疑古派否定司马迁《史记》的黄帝谱系；撰文《论夏禹建立大一统王朝及其文化渊源》指出大禹建立的夏王朝再次实现我国远古时代的“大统一”，批评史学界漠视我国远古早已实现“大统一”的史实（载《炳烛文丛》，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4 年）；发表论文《对“烛龙神话即极光现象”说的质疑》（载华南师大学报 2003 年 5 期），指出有论者称禹的父亲鲧被杀于“大地的‘最北极’”即今天所说的北极圈，以及把《山海经》的章尾山、钟山、委羽山等均列入北极区范围，实在荒唐！还探讨远古华夏先民的宇宙观（见《〈山海经〉宇宙观初探》，华南师大学报 2009 年第 1 期），探究青铜器艺术美的《略论青铜饕餮的“狰狞美”》（华南师大学报 1998 年第 4 期）。近来发表《我国远古时代的北斗崇拜》（载南宁：《文史春秋》2019 年第 6 期），介绍我国远古时代以猪为象征的“北斗崇拜”，并批评有论者称该神话传说源自印度，是毫无根据的比附，等等。所论均有一定的针对性，有理有据，不少为人所未论。广州《信息时报》2010 年 11 月 7 日年以“一生与华夏文化结缘”为题整版刊载记者对韩作了专访介绍。

（文章由本人提供）